



歸有光文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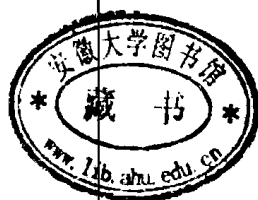
新譯

行印局書民三／書叢譯新注今籍古／譯注 平國鄔
類 學 文

鄔國平 注譯

新 譯
歸 有 光 文 選

三民書局 印行



震川問象



歸有光畫像

秋風正印秋有六也衣
標志在千里北勝之
何時連同控府未能
之梓標象青烟
象之與仿以美金
手惟嘆均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心量，冥契古今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

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的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導 讀

在中國散文史上，人們不會忘記這樣的一個名字——歸有光。五百年過去了，時間洗汰了多少雄偉壯麗燦爛顯赫的事物，無窮的繁華和光榮轉瞬都滅跡了，然而，歸有光傾注其摯情寫就的散文，感動過古人，如今依然在感動現代的讀者。它好比既望的月光，永遠清明如水，在人們心頭撩起悠長的夜思。只要有像歸有光這樣的作者存在，我們就不應當無端懷疑人世間還有東西可以稱為悠久。

一

歸有光，字熙甫，又字開甫，號震川，又號項脊生。生於明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趕著歲末來到世上，而西曆已經是一五〇七年初頭。他的家鄉崑山，今屬江蘇省。遠祖自唐宋以後，官越做越小，到歸有光祖、父，皆以讀書力田為業，逐漸降為一般人家。然而家人依然懷念著往昔的光榮，不泯振興家道的願望。歸有光祖母一直將她祖父上朝使用過的一條象笏珍藏在箱子，她不甘心「吾家讀書久不效」的現實，相信總有一天境況會改變。聰明、刻苦的歸有光讓她看到了一線復興的希望，一日，她將這條象笏鄭重地交給了孫子，說：「他日，汝當用之。」（見歸有光《項脊軒志》）話語含著殷殷的期待之情。這成為歸有光終身孜孜追求功名的動力。

他早年就有四方之志，以為治理天下當如良醫治病，是自己的責任。他每為不能像古代豪傑恣放地

按照自己願望做事而深感苦惱，便借高聲大言維繫心理的平衡，《自生堂記》回憶道：「予是時年少放誕，慨然以古臯、夔自命。」這招來別人的嘲笑，也引起一些人忌恨，從而使他在同齡人中陷於孤立。〈與吳三泉〉信說：他與二百餘名秀才一起參加讀書等活動，「時嘗會聚堂下，笑語喧譁，而僕蹣跚無所與，讀壁上碑刻，仰面數屋椽耳。」這恰似一幅鴻鵠不與燕雀共飛的畫圖，逼真地寫出了年輕的歸有光傲然性氣。明代中期，社會進入了按部就班、慢速運行的階段，它適合循規蹈矩、機靈而順俗者生存，想超越方規、表現自己能力的人，其生存空間卻是極小的。歸有光不願被平庸的環境淹沒掉，他以古代良吏自期，幻想有朝一日被慧眼發現，脫穎而出，有一番大作為。他尤其心儀司馬遷，想像自己也能像這位偉大的史學家運用如椽之筆，寫出大文章，經世濟用，為後世所尊敬。他是一個好高騖遠的青年，對追求創造和卓越有足夠多的自信，而適應世俗的能力又明顯偏弱，這決定他未來所走的必然是一條不平坦的道路。

他從二十歲開始參加鄉試，連考五屆，至三十五歲獲應天鄉試第二名中舉。又從次年即三十六歲開始，參加進士考試，連考九屆，直至六十歲才考中三甲進士。四十年寶貴的生命就這樣在科舉考試中消耗，他自述在這一條道路上「垂老不肯自摧挫」，「不退卻」（《上萬侍郎書》），這固然反映他性格的堅毅，對自己的自信和負氣不屈，但是，考試落榜（尤其是屢試進士不第）讓他感受到的委屈、沮喪、恥辱，也是一言難盡。

後人尊稱歸有光是時文大師，然而他實際的應試成績並不佳，這二者相去甚遠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雖然任何考試都不可避免的帶有偶然性，對此，「運氣」二字可能是對不可解釋的事物最好的一種解釋。但是，像歸有光屢試進士不第是不能簡單歸於偶然性或運氣所致。徐學謨〈書歸僕丞解惑篇後〉一文為歸有光長期考試落榜的原因作出了有說服力的解釋，他說：

蓋熙父（引者按：歸有光）自鄉薦後，嘗以為舉業可無學而能，即棄去不復習，而益習古文詞，比應試簷幕間，已不能促辦，稍信筆摭寫胸中所自得而已，于有司之繩尺闊如也，故試輒不利。予在禮部久累科，拾其落卷，則寄還熙父，欲懲患之略尋時套也。（《徐氏海隅集》文編卷二十三）

很清楚，歸有光落榜的主要原因，就在於他的答卷「於有司之繩尺闊如」，不合「時套」。其實這倒不是因為歸有光沒有能力去掌握時文的格套，而是他不認同當時八股文流行的「時套」，想把古文的因素植入時文，變軟熟為新警，變淺近為古奧，即所謂以古文為時文。然而在考官眼裡，歸有光的文章顯然不對路子，因而將它淘汰。這與後來時文風格發生改變，人們視歸有光以古文為時文的作品為範文，給予高度評價，情況是不相同的。惡魔一般的考試經歷，使歸有光對八股科舉制度的弊端有了切膚而深刻的認識，另外，他屢試不第，更引起了人們對他高度的關注和同情，這又使他的名聲進一步增大了。

由於考中進士的等第低，嘉靖四十四年（西元一五六五年），歸有光被授予長興縣知縣。長興今屬浙江省，與崑山隔著一座太湖，煙波浩瀚。有時候，歸有光望著湖上行船，想念家鄉和親人，也回憶年輕時代的夢想，每想起祖母交給他象笏時說的一番話，想到自己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竟橫亙如此巨大的溝壑，感受十分複雜。然而他並不因此氣餒，他的性格是不屈服，不退縮。出仕的歲數高，他常常想到古代老臣也能建立豐功偉績；縣令位低權輕，他又常常想起先賢在這一職位做出的名傳青史的勳業，他用這些故事勉勵自己，做一個稱職的縣令。他辦事的風格取寬不取嚴，與時相左，短期的效率可能不明顯，不像吆三喝五的縣老爺，上司說辦的事情立時三刻就能見到成效，而歸有光則著眼於對人「元氣」的養護，風俗的培植，意在根本，功求長遠。這在官場上許多人看來是迂腐可笑不足為的，因此受到非議和嘲弄，他不以其為然。他關心弱勢平民的利益，遇到他們與豪右發生利害衝突，則往往是抑豪右，扶平

民。對於上司，他不應酬，不奉承，對於他們下達的指示，酌情執行，如果是嚴重擾民的事，他會頂著不辦，他以為這有利於恢復吏治古風。結果，豪右與官府不能忍受他如此「不識時務」，聯合起來排擠他，使他被迫離開長興。為此，縣生員還鬧了一次「學潮」，他們出於義憤，聯名上書要求留任歸有光，帶頭的因此遭到拘捕。這可以說是對歸有光在長興縣三年政績最好的鑒定。

隆慶二年（西元一五六八年），歸有光調任順德府馬政通判，次年夏五月赴任。順德府，治所在今河北邢臺。通判是一個閒職，歸有光所能做的只是一些傳遞公文的事情，十分無聊。對於思想作為的人來說，最苦悶、最難熬的無過於閒著，所以這段日子歸有光感到異常寂寞和痛苦。稍使他感到欣慰的事情是，他在任上編纂了一本《馬政志》，可見作者良史之才。這年冬天，他入京賀萬壽節，被留在京城供筆劄。隆慶四年（西元一五七〇年），陞南京太僕寺丞，仍留京，掌內閣制敕房，纂修《世宗實錄》。這一方面可以閱覽內閣藏書，另一方面又可以發揮自己的文才，儘管他對人際關係還不甚滿意，總的說這一任命是符合他心願的。歸有光似乎終於找到了自己合適的崗位，顯得心平氣舒，可以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滿足的日子。他想要好好利用現有的環境和條件，繼續勤奮地著述，流傳後世。然而，他從小虛弱多病，此時身體已經載不起他的雄心和抱負，隆慶五年（西元一五七一年）正月十三日，歸有光在京逝世，享年六十六歲，天下為之歎惜。

李贄〈寄答京友〉說：「夫才有巨細。有巨才矣，而不得一第，則無憑，雖惜才，其如之何？幸而登上第，有憑據，可藉手以薦之矣，而年已過時，則雖才如張襄陽，亦安知聽者不以過時而遂棄，其受薦者又安知其不以既老而自懈乎。」除了「上第」二字和最末的一句話外，李贄這番話彷彿說的就是歸有光，為他畫了一幅像。

由以上介紹可知，歸有光的仕途經歷十分平常，就此而論，史家是不屑為他立傳的，然而他卻在《明史·文苑傳》占有一席之地。這倚憑什麼？毫無疑問，是歸有光的古文成就獲得了史家首肯。中國正史體例的核心觀念雖然是官本位思想，但是又並非完全如此，也能容納一些真有才具、做出貢獻而官位不顯的人物，這是包含在舊史書中的精華。

歸有光生長和活動的明正德、嘉靖、隆慶三朝，文壇一方面充滿濃厚的復古氣氛，另一方面又有人對此表示異議而別求創作的途徑，是一個物極而漸趨相反的時代。形成主要對峙的是前後七子和唐宋派兩個陣營。從前後七子方面情況看：歸有光十六歲，何景明卒；二十四歲，李夢陽卒；李攀龍比他小九歲，王世貞比他小二十一歲。再看唐宋派方面情況：唐順之比他小二歲，王慎中比他小四歲，茅坤比他小七歲。歸有光看到了前七子謝幕，而又比後七子及唐宋派唐、王、茅三氏的資格都老，他是這時期文壇演變的目擊者。然而歸有光不只是文壇風氣變化的見證人，而且更是參與其中，積極推動文風發展的建設者。

前後七子以「文必秦漢」相號召，尤其是「二李」（李夢陽、李攀龍）傾全力恢復艱深僻奧的文章風格，反抗宋朝以後形成的、並占主導地位的以平美為特色的散文傳統，他們提倡的秦漢文風因為時人所「陌生」而喚起了新鮮的感覺，重新獲得比較廣泛的認同，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復古聲浪。然而，即使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平美的文風依然是文壇的主流。李攀龍因主張斷然，且文風與其主張高度一致，因而在該派中具有代表性，以他為例可以說明這個問題。王世貞〈李于鱗先生傳〉載，李攀龍「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，諸弟子不曉何語」，因而嘲笑他為「狂生」。該文又說：時人對於李攀龍的散文，「駭與

「尊貴者相半」^①。由此可見，即使在前後七子復古運動的後期，李攀龍所嚮往的古文，以及他本人寫作的古文作品，也還並未被大家普遍地熟悉或接受。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，散文的主流不在於此。

唐宋派對於秦漢散文尤其是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也是推崇的，可是他們更強調學習唐宋大家的文章，以為只有在掌握了唐宋古文法則的基礎上，再上求與秦漢散文的精神相續接，才是有效的途徑。而且他們對於前人的散文，主張求其神似，反對模仿。所以他們對沿著唐宋古文發展而來的明代當下的文風，在理論上予以肯定，在寫作實踐中予以維護，不採取否定現狀和復古的方式，這與前後七子形成鮮明的對照。這一派的聲勢雖然沒有像前後七子那麼洶湧澎湃，可是那時多數文人就是這麼寫文章的，而且它又與時文保持著緊密的聯繫，所以，這一派實際代表了當時文壇的主流。

歸有光走著一條與前後七子不同的散文創作道路。他在古文發展觀方面，相信自然生變，不相信不合自然進程的、生硬的逆轉，所以他以為前後七子所鼓吹的文風會有前途。另外，他對唐宋古文流行到明代而產生平庸軟熟的弊端，也深有憂心，改良的願望遠比唐順之、王慎中等人強烈。所以，歸有光一方面依然遵循唐宋以後的主流文風撰寫古文，同時又突破其藩籬，這主要是指積極地汲取《史記》風神和筋力，將其融入到平美的古文風格中。總而言之，歸有光的文學觀與前後七子主要表現為一種對峙的關係，與唐宋派則以相互呼應為主，而在呼應中，歸有光又更多地表現出改良現實文風的自覺願望。他具體的文學批評主張，要義有如下幾項：

（一）強調學習《史記》。歸有光自謂「性獨好《史記》」（《五嶽山人前集序》），自詡對它「獨有所悟」

① 引自李攀龍《滄溟集》附錄，隆慶六年張佳胤序刻本。王世貞在文章中作為對照而又談到，人們對李攀龍的詩歌「則心服靡間言」。這主要是指七子同人或中立派別做出的反應，如果從反對派方面的情況來看，這一判斷是不能夠成立的。然而王世貞指出人們對李攀龍的散文與詩歌有不同的評價，當是可以相信的事實。前後七子提倡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，就他們的實際創作而言，詩歌的成績在文章之上，得到的支持相對也多。人們對李攀龍散文和詩歌的不同評價在這方面具有相當的代表性。

（《花史館記》），他評點的《史記》是一生心血的結晶。該書不僅揭示文章作法，也加意求究作者的大義用心。他愛好《史記》的寫作藝術，又重視酌取司馬遷思想，尤其對他批判現實的精神多有肯定和借鑒。

（二）反對否定唐宋古文傳統。《項思堯文集序》痛斥前後七子及其追隨者「詆排前人」，即針對他們蔑視唐宋以後的古文傳統而言，歸有光針鋒相對地提出：「文章至于宋、元諸名家，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。」這與前後七子割裂的、留首去尾的散文史觀截然不同。

（三）批判模擬風氣。《與沈敬甫》信云：「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，自謂欲追秦漢，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，而海內宗之，翕然成風，可謂悼歎耳。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，此誠何足辨也。」他又說：「近來頗好剪紙染采之花，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。」他稱這些都是「俗子論文」（《與沈敬甫》），只會將作者引入泥沼。他指出：學古的意思是學古人抒寫真情，而不是模擬古人的腔調，所謂「千古哭聲未嘗不同，何論前世有屈原、賈生耶？以發吾之憤憤而已。」（《與沈敬甫》）

（四）作者既要寫胸中所有還需要加強藝術琢磨。《與沈敬甫》說：「文字又不是無本源，胸中盡有，不待安排。只是放肆不打點，只此是不敬。」其中「不待安排」是指抒情真實，不虛偽，否定「放肆不打點」是指尊重文章法則，多加琢磨。這裡他特別強調，作者對於文章寫作藝術應當抱持「敬」的態度。

（五）寫文章忌「喜異而忽其常」，所以不當只記述「感慨激發、非平常之行」（《沈母丘氏七十序》）。重視「常」是歸有光一條重要的寫作經驗，也是他貢獻給古代文論的重要意見。

（六）作者要保持堅定的信念，不必因為一時不被別人賞識而動搖信心。他囑人作文不要「為外道所勝」，不要「為外面慕羶蟻聚之徒動其心」，而要時刻保持自己的「清明之氣」。一時得不到賞識並無關係，因為文章「如璞中之玉，沙中之金，此市人之所以掉臂而不顧也」，可是文章並不因此而改變定價，所以不必為此而喪失信心（以上引文皆見《與沈敬甫》）。

上述文學主張貫穿於歸有光一生的寫作活動中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的創作成就和個人特色的

形成。

三

歸有光是一個積極入世的文人，一直關心世事，他的書齋和社會之間沒有門板的隔閡，他的筆以生沽為墨汁，浸蘸得分外飽滿。他從閱讀中求得前人的思想經驗，用之於觀察和思考自己所處的現實，目光敏銳，往往能夠發現社會民生和吏治所存在的問題及弊端，予以尖銳的批判，提出改進的積極建議，體現出公共關懷意識。這使他相當一部分文章帶有旺健的「火氣」，形成批判的傾向。

他主要批判了以下的社會現象：

(一) 侵漁百姓

明朝中期，社會開始醞釀動盪，外部的因素如北方有韃靼、瓦剌部落族擾，東南有倭寇引起的騷動，內部的因素則是官府不斷加重盤剝，一遇災害，老百姓走投無路，鋌而走險。歸有光長期生活在江南，親眼目睹倭寇之害，曾參加崑山抗倭的活動。明人鄭若曾《江南經略》卷二下記載：嘉靖三十三年夏，倭寇攻城，縣令祝乾壽曾與「舉人歸有光」等人「籌畫便宜」，組織堅決有效的抵抗，「城得不破」。歸有光《崑山縣倭寇始末書》就是根據他親身的經歷寫成的一篇「報告文學」。與有些官員、文人將一切罪責往倭寇一推了事不同，歸有光卻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：為什麼發生倭寇之變時，當地卻有人不顧官府嚴禁，與倭寇「私通」，甘願當「嚮導羽翼」？難道心地不善一句話就能夠將這一現象解釋透徹？非也。歸有光給出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答案：

兵燹之餘，繼以亢旱，歲計無賴，萬姓嗷嗷。顧又加以額外之徵，如備海防，供軍餉，修城池，置軍器，造戰船，繁役浩費，一切取之於民。議及官帑，輒有擅專之罪。然此亦適中有司之計，蓋官帑有限，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，得以恣其侵漁耳。

夫東南賦稅半天下，民窮財盡，已非一日。今重以此擾，愈不堪命，故富者貧，而貧者死。其不死者，敝衣枵腹，橫被苛斂。皆曰：「與其守分而瘐死，孰若從寇而倖生？」恒產恒心，相為有無，無足恠者。若非頃者大為蠲除，恐此輩不外而倭，即內而盜矣。未必皆斯民之過也。（《上總制書》）

他以為，根本原因是官府「恣其侵漁」，把百姓逼上了絕路，而人的求生本能讓他們墮落而去助倭，或成為強盜。其禍根其實在於官方實施的制度和養育的貪官，「未必皆斯民之過也」。這在坐江山者聽起來，無異於是一種「強盜邏輯」，而歸有光本於民間的「草根性」思惟在這裡得到了充分顯示。他針對官吏所謂「俗不善」之說，進行嚴正地反駁：「嗟夫！民之望于吏者甚輕，苟不至于虐用之，而示之以可生之塗，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。今則不然，徒疾視其民，而取之惟恐其不盡，戕之惟恐其不勝。民俛首不敢出氣，而閭巷誹謗之言，或不能無。如是而曰俗之不善，豈不誣哉！」（《送攝令蒲君還府序》）這一系列話句句鏗鏘有力，將治民者的歪理徹底拆穿。

（二）公論不明

導
9
明朝官員的擢升和黜退，有專門的考核制度，然而，這種考核制度建立在逐級彙報基礎之上，參與其中遊戲，或操縱輿論的，往往是有權勢背景的人物，民間輿論很難有效得到反映，更談不上被尊重，因此，官員的命運未必與百姓、政績有真實的聯繫，甚至可能存在顛倒的關係。歸有光認為這造成公論

不明，是吏治敗壞的一個癥結，也是使正直之士喪氣失望的原因。他說：

承平既久，士無賢不肖，率以資敘，交馳橫鶩，布列天下之要位，以行其恣睢之意，窮閭之民，愁苦籲告，而扳援憑藉，巧文掩護，時得忠勤之褒。至於仁人志士，不幸偃蹇於卑服，竭力以行其所志，而蒙其恩者，交口贊頌，上之人猶掩而弗聞，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，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，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。（《送夾江張先生序》）

歸有光本人在長興縣令任上被擠走，也是因為負責考核的上司片面聽信豪右誣告，對底層百姓的公論置若罔聞所致。他說：民間的「是非甚真」，而「今在位者，徒信流言，小民之情，其伏也久矣。」（《與王禮部》）他對這樣的現狀十分感慨。歸有光強調應當重視公論，又以為真正的公論在民間，不在豪右和官府，這些都是深刻卓越的意見。

他對只為了自己富貴而競奔仕途的文人十分不屑，看到國家倚重這些人，不免憂心忡忡：

而比年以來，士風漸以不振。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，要不可謂無人也，自餘奔走富貴，行盡如馳，莫能為朝廷出分毫之力，冠帶褻然，輿馬赫奕，自喻得意，內以侵漁其鄉里，外以芟夷其人民。一為官守，日夜孜孜，惟恐囊橐之不厚，遷轉之不亟，交結承奉之不至，書問繁於吏牒，餽送急於官賦，拜謁勤於職守。其黨又相為引重，曰：「彼名進士也。」故雖犖然肆其恣睢之心，監察之吏，冠蓋相望，莫能問也，居無幾何，陞擢又至矣。其始羸然一書生耳，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，此何從而得之哉？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，用之者何如，爵祿寵錫之者何如也。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？將富貴之地，使人易

眩，失其守歟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，而如是彌望，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。（《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》）

這是一幅很醜惡的「陞官圖」，對鑽營者醜惡的心態刻畫得入木三分。歸有光深刻之處在於，他認為這些人的壞，可能並不是一路進官場「富貴之地」以後才開始的，可能他們原本就缺乏「懇惻」之心。然而他們卻得到委任，並且被不斷擢升，這只能證明國家的評價系統出了嚴重的問題。紊亂的評價系統造就了一大群勢利小人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這群小人又承擔著管理國家、引導社會風氣、教誨弟子的責任，他們都能成為當時社會人類靈魂的工程師。這豈不糟糕透頂！

（三）才士不得出頭

這是針對八股科舉制度存在的弊端而言。明朝中期以後，對入仕者要求進士出身越來越嚴格，也就是說，門越來越窄。歸有光不以為這是進步，他留戀從前實行的「三途並用」（即進士、科貢、吏員都得到重視）較為寬大的任賢路線，認為只重進士必生偏頗，為此撰有〈三途並用議〉一文。他對惟進士是重，循名不責實，因而失去了進退官員的公正性，提出尖銳批評：

自進士之科重，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。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，當論其人之才不才，與其事之治不治，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。而今世則不然。……歲遣御史按行天下，以周知其吏之賢否。而御史所至，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。苟不肖也，進士也，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，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，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。既而罪跡暴著，而加之罪罰矣，猶若難之。苟賢也，非進士也，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，必非